

# 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的 当代使命与发展路向初探

徐友龙

**摘要：**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是传播哲学社会科学成果、传承哲学社会科学思想、引领哲学社会科学发展、促进哲学社会科学交流和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平台和阵地，也是反映一个国家学术研究质量和水平的重要指标。面对新形势，社科学术期刊工作者，应该以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和《意见》要求为指导，把坚持正确政治导向摆在第一位，把提升规模、效率作为主要发展方向，把国际化发展提上重要议事日程，把坚持正确学术导向作为重大标尺，把创新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评价体系作为基础性工程，推进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加快构建。

**关键词：**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习近平；学术期刊评价

**作者简介：**徐友龙，男，副编审。（浙江省社会科学院 《观察与思考》杂志社，浙江 杭州，310007）

**中图分类号：**G23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552 (2017) 04-0082-08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主持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并发表了重要讲话，一周年后，中央宣传部在京召开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贯彻此前印发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党中央在十八大以来，为加强和改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和理论研究工作所作的一系列密集部署，尤其是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及出台的《意见》，具有很强的系统性、思想性、指导性和前瞻性，是新形势下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纲领性文件，为我们牢牢把握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更好地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构建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提供了基本遵循。

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是哲学社会科学知识和思想生产链条中的重要终端，是传播哲学社会科学成果、传承哲学社会科学思想、引领哲学社会科学发展、促进哲学社会科学交流和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平台和重要阵地，也是反映一个国家学术研究质量和水平的重要指标。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把“报刊网络理论宣传”提到了作为“深化拓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宣传教育”<sup>[1]</sup>的重要工作平台的高度。面对新形势、新要求，社科学术期刊工作者，应该以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和《意见》要求为指导，把坚持正确政治导向摆在第一位，把提升规模、效率作为主要发展方向，把国际化发展提上重要议事日程，把坚持正确学术导向作为重大标尺，把创新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评价体系作为基础性工程，推进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加快构建。

## 一、增强做好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的自豪感和使命感

自1665年法国《学者》杂志、英国《皇家学会哲学汇刊》杂志等出版算起，学术期刊已经有三百五十多年的历史了。作为一种特殊的传播媒介，学术期刊除传播知识与信息的基本功能外，还具有转化学术成果、评价学术质量、引导学术研究、传播学术思想的功能。习近平同志指出：“中华文明历史

悠久，从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到隋唐佛学、儒释道合流、宋明理学，经历了数个学术思想繁荣时期，形成了丰富的哲学社会科学内容、治国理政智慧，为古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提供了重要依据，也为中华文明提供了重要内容，为人类文明作出了重大贡献”，这其中，借助于书写载体，尤其是中国古代的造纸术、印刷术的发明及运用，书籍在中华文明传播和中国传统哲学社会科学的传承中发挥了极大的功效。

到了18世纪末，在传统的丛书出版、报纸启迪下，我国学术期刊开始萌芽，清乾隆57年（1792年）产生了中国学术类中文期刊的鼻祖——《吴医汇讲》，是类似年刊性质的中医杂志。但近代意义上的期刊，在我国出现则是在鸦片战争前后。19世纪后，我们的国家和民族经历了刻骨铭心的惨痛历史，随着列强入侵和国门被打开，我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西方思想文化和科学知识随之涌入。当时西方思想文化和科学知识的“涌入”，报刊是一个重要的载体。从那个时候开始，区别于传统书籍的近代报刊，成为与国门的被迫打开同时的“舶来品”，期刊的社会影响力也逐渐为中国人所广泛认识。19世纪初，出版书刊报纸成为当时西方传教士在中国传教的便利方式。1815年8月，由英国传教士米怜创办并主编、面向东南亚华侨地区散发的《察世俗每月统计传》在马六甲创刊，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份近代化报刊。1833年8月，普鲁士传教士郭实腊在广州创刊《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这类在当时报、刊不分的宗教性读物，除宗教外，也刊发政治、经济、科学文化知识、新闻等内容，实际上也是当时西方思想文化和科学知识流入中国的主要途径。由此，国人办报刊的理念得以萌发。

1838年底，主政广州禁烟的林则徐派人到澳门搜集各种外文报刊中有关鸦片贸易等方面的信息、言论，汇集为《澳门新闻纸》，而林本人亲自加工、润色的则另编为《澳门月报》，成为朝廷制定政策的参考材料，正所谓“师夷长技以制夷”之需。1842年，魏源依据林则徐托付他的文献资料，整理编著《海国图志》，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部全面系统介绍世界历史地理的巨著。于是，清政府“只准外人而不准国人”办报刊的“愚蠢政策”受到郑观应等开明人士的批判，“报禁”、“言禁”逐步有限度地开放，先后出现了维新派创办的《中外纪闻》《时务报》，资产阶级革命派创办的《苏报》《民报》，民国时期的《中华民报》《民国新闻》《民权报》等发展高潮。近代报刊的第一次大发展，虽在袁世凯上台后遭受“癸丑报灾”而由盛转衰，但对于西方文化的传入、本土思想的解放和新的社会力量的发展，这些报刊都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辛亥革命的失败和北洋军阀统治的建立，中国的出路问题再一次使有识之士彷徨。陈独秀于1915年创办《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发起了倡导民主和科学，反对封建主义旧文化的“新文化运动”，李大钊、鲁迅、胡适、钱玄同、刘半农等均是当时的编辑和主要撰稿人，开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先风。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使得一些进步人士开始敏锐地意识到马克思主义才是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强大思想武器。从陈独秀在《新青年》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李大钊帮助北京《晨报》副刊开辟《马克思研究》专栏开始，许多进步学者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倡导运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社会。公开出版的《新青年》，半公开的《共产党》月刊，以及早期组织成员利用上海《民国日报》的副刊《觉悟》、湖北《武汉星期评论》、广东《群报》、济南《励新》半月刊等均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主阵地。其中，1919年7月在长沙创刊由毛泽东任主编的《湘江评论》，因创刊号刊登了署名毛泽东的《〈湘江评论〉创刊宣言》，被李大钊赞为“是全国最有份量、见解最深的刊物”。这些出版活动，有力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传播及其同中国社会的进一步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提供了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指导。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各级党的政治机关刊物和其他进步期刊，成为中国革命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革命文化的重要舆论向导。更值得关注的是，相当一部分党的领导人都有

过创办报刊的经历,可以说,是革命理论的传播和辩论为我们党带领中国人民取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提供了方向,也培养了诸多的老一辈革命家。1920年11月在上海创刊的《共产党月刊》是上海发起组创办的机关刊物,李达任主编;1922年9月在上海创刊的《向导》周报是中共中央第一个政治机关报,蔡和森任第一任主编;1922年8月,在法国巴黎,由赵世炎、周恩来等发起成立“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创办了《少年》月刊(1924年2月改名为《赤光》),周恩来、李富春、蔡畅等是主要撰稿人,而年仅18岁的邓小平作为编辑部年纪最小的一名青年,直接受周恩来的领导,先是负责蜡板刻写和印刷、装订方面的工作,因为认真负责、严谨敬业而赢得“油印博士”戏称,后担任编辑;1925年在广州创办的《政治周报》是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出版的中央级机关报,《湘江评论》老主编毛泽东任第一任主编;1931年12月在江西瑞金创刊的《红星》报,是中国工农红军军委机关报,1933年后由邓小平任主编;而瞿秋白短暂而辉煌的一生,更是与报刊结下难解之缘,是我们党杰出的革命家、理论家和宣传家。在中国社会变革的特殊环境下,一大批党的早期领导人正是在创办报刊、引领舆论、探索救国道路的实践中迅速成熟,发展为伟大的职业革命家。这几乎也是社会变革时期职业革命家成长的一大特色。

新中国成立后,1957年3月,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后,我国的时政、理论期刊纷纷创刊,出现了短暂的繁荣态势:以1958年6月中共中央主办的理论刊物《红旗》杂志创刊为肇始,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也先后办起了本地区的理论刊物。但随着“双百”方针受挫折,期刊与其他新闻出版事业一道,先后经历了反右运动、“大跃进”宣传、文化批判活动等曲折发展,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空前浩劫。直到改革开放后,期刊事业发展才日趋繁荣,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大专院校、科研院所、学术社团等社会组织大规模办刊,进入一个最快的发展时期。截至2015年底,全国共出版期刊10014种,约三分之二为学术期刊,仅次于美国;其中2635种哲学社会科学类期刊中,学术期刊约占80%,论文总量同样列世界前列。总体看,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已初步形成了学科门类齐全、基本满足科研学术交流需要的出版体系,成为传播学术成果、交流学术思想、推动改革开放、总结中国经验的重要学术载体。但由于我国学术期刊包括哲学社会科学期刊均起源于教育实践,依附于主办单位,万余种期刊分散在五千多个主管、主办单位,一个单位平均经营1.6—1.7种,且“同质化”现象严重,故整体呈“全、小、散、弱”现象,出现“有期刊、缺名刊”的发展状态。

综上,哲学社会科学期刊自诞生开始,在承担哲学社会科学交流与传播,特别是促进民族救亡、推动社会发展、繁荣创新文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同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有期刊、缺名刊”的现状与“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还处于有数量缺质量、有专家缺大师的状况”<sup>[1]</sup>正向关联。这也意味着,社科学术期刊做大做强的发展改革,必然与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目标同向共频,也需要期刊社和期刊人切实增强做好哲学社会科学期刊的自豪感和使命感。<sup>[2]</sup>

## 二、增强做好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工作的紧迫感和责任感

“新形势下,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地位更加重要、任务更加繁重”,习近平同志对此作了深入、全面、系统的剖析:提出了“五个面对”的新形势,进而强调关注“十六个如何”的重大现实问题,继而又反复强调“迫切需要哲学社会科学更好发挥作用”,也“迫切需要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立时代潮头、发思想先声,积极为党和人民述学立论、建言献策”,并指出了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还存在着不少突出问题。<sup>[1]</sup>而事实上,一些领域存在的突出的问题,如马克思主义边缘化、话语体系缺失、学术评价不



科学、学风不正等问题，与学术期刊没有发挥积极的引导作用，甚至在“言必西方”的文化自卑、“只重数量不求质量”的指挥棒、缺乏监管的“收版面费”等情况下推波助澜不无关系。作为思想传播的终端载体，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同样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和不可推卸的重要职责，即作为学术平台和阵地，具有发挥转化学术成果、评价学术质量、引导学术研究、交流学术思想、构建学术体系等重大功效和职责，需要我们切实增强做好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工作的紧迫感和责任感。

第一，做好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工作，必须把坚持正确政治导向摆在第一位。马克思认为：“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态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sup>[3]</sup>正是从这样的高度出发，习近平同志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强调：“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进步，国际地位和影响也日益扩大，但一些西方国家把社会主义发展壮大视为对其价值观念和制度模式的挑战，加紧进行思想文化渗透，加上我国正处在一个快速发展期、社会转型期、改革攻坚期，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相互叠加、集中呈现，各种社会思想意识交流、交融、交锋又十分激烈，在此背景下，“能否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sup>[4]</sup>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作为思想舆论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肩负着“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的特殊而重大的职责。

在强调期刊学术性的同时，必须旗帜鲜明地强调社科学术期刊的意识形态属性，贯彻“政治家办报”这一党的优良传统和一贯主张，确保正确舆论导向。一是在事关意识形态领域政治原则和大是大非问题上，尤其是对一些人极力宣扬的所谓“普世价值”、“宪政民主”、“新自由主义”等论调，对那些恶意攻击党的领导、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歪曲党史国史、造谣生事的言论，不仅不能为其提供空间和方便，更要增强主动性，掌握主动权，打好主动仗：要刊发高水平、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客观揭示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倡导的是一个“各国政府被跨国公司和金融集团的决定压倒”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以及导致“金融危机”恶果的事实；自信说明中国所走的不同于西方的政治和法治道路，远远超出了西方宪政民主的范畴的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深刻揭露西方鼓吹的“普世价值观”对内高喊“多样性”，对外高喊“普世性”的片面性和虚伪性；对社会上、网络上有些恶意攻击、歪曲造谣的言论，要善于摆事实、讲道理，澄清谬误、明辨是非。二是在日常学术活动中，要引导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者坚持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既要发扬民主，以理服人，对国外的理论、概念、话语、方法，要有分析、有鉴别，做到研究无禁区、传播有纪律；又要从我国改革发展的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三是在出版管理中，要正确区分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不要把一般的学术问题当成政治问题，也不要把政治问题当作一般的学术问题，既反对打着学术研究旗号从事违背学术道德、违反宪法法律的假学术行为，也反对把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混淆起来、用解决政治问题的办法对待学术问题的简单化做法。四是把培养优秀“把关人”作为发展的重大支撑。库尔特·卢因指出，传播过程中，只有符合“把关人”价值标准的信息内容才能进入传播的管道。对学术期刊编辑队伍的管理和培养，既不同于纯行政部门，也不同于纯科研部门，而应作为科辅部门进行探索，要推动期刊社站在历史和时代的制高点上办刊，要创造能够吸引具有思想觉悟、领导能力、学术眼光、操守格调以及愿“为他人作嫁衣裳”精神的编辑加入学术期刊社的良好环境，加快推进学术期刊主编、编辑的专业化、职业化建设。

第二，做好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工作，必须把提升规模、效率作为主要发展方向。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和中央的《意见》都明确指出，要“加强报刊、网络理论宣传阵地建设，

重点建设一批党报党刊理论版、理论网站（频道），加快形成有影响力的全媒体宣传阵地”。<sup>[1]</sup>当前，我国已堪称期刊大国和论文大国，但学术期刊的国际影响力却普遍不足。这一方面是因为先天的我国学术期刊普遍依附于主办单位而少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历史渊源，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当前的出版管理体制明确出版单位必须依托于相关社会组织的后天强化所致。因此，学术期刊领域“势单力薄”衍生出的同质严重、体制僵化、经费短缺、影响力小、学术水平不高、国际竞争力弱等几成固症顽疾。面对存在的问题，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于2009年4月制定出台《关于进一步推进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将分类改革与加快报刊结构调整结合起来，以“改制”为抓手，按照做强做大批、整合重组一批、退出停办一批的原则，推动报刊资源向优质报刊出版单位流动。但不与国家科研管理体制、高等教育体制的改革同时考虑的期刊改制，因缺乏联动机制，而难免陷入空谈。事实上，2009年以来的期刊出版改革，除了中央各部门和高校出版社转企改制外，并没有对学术期刊形成明显的变革影响。

新形势下，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必须以提升规模、效率作为主要发展方向，做大做强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长期关注新闻出版业改革发展的全国政协委员、原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李东东就曾提交过《关于设立国家重点学术期刊建设工作的提案》，有不少值得借鉴。具体来说，要做以下探索：一要扶持重点发展。如从国家和省（市、自治区）两个层面，持续推进目前正在进行的“国家社科基金资助期刊”工作，建立“重点学术期刊”遴选与动态管理机制，集中力量分别扶持一批能够跻身国际先进期刊行列的权威学术期刊，发展一批具备国际水平、国内一流的重点学术期刊，培育一批有潜力、快速发展的重要学术期刊。二要鼓励独立发展。将期刊社发展为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出版单位，改变主办部门“下属行政部门”或“下属科研机构”的管理窠臼，将学术期刊出版单位发展为“期刊社”而不是“编辑部”，鼓励从单一的出版、发行工作管理部门，转变为学术研究的引导者、学术成果的发布者、学术论坛的组织者、学术议题的设置者，甚至发展为能为决策服务的小型现代智库，是学术期刊社未来承担起党中央要求的“有影响力的全媒体理论宣传阵地”的体制、机制前提。三要提高效率发展。要从传统的编辑出版纸质学术期刊，向“全媒体理论宣传阵地”拓展，一方面期刊社本身要着力加快网络化、数字化出版工程建设，尤其是在电子期刊、开放获取期刊等新形式期刊不断涌现的挤压下，加快实现在线投稿、在线编辑、在线销售和刊物数字化出版、国际化传播；另一方面，在公共服务方面，要按照总书记在讲话中提出的要求，“运用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加强哲学社会科学图书文献、网络、数据库等基础设施和信息化建设，加快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建设，构建方便快捷、资源共享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信息化平台。”<sup>[1]</sup>四要探索集群发展。目前我国学术期刊真正转企改制的单位不多，但期刊界也有不少探索创举。在张耀铭看来，近些年来学术期刊呈现了四种集群化发展模式，笔者以为，其中值得关注的就是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集合“1报8刊1网”打造的大型综合性报刊传媒集团模式，以及中国科学出版集团汇聚260多种专业科技期刊形成的大型学术期刊集团模式，他们的实践为社科学术期刊做大做强提供了借鉴。<sup>[5]</sup>

第三，做好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工作，必须把国际化发展提上重要议事日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表明，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一定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的时代。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坚持理论创新，正确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课题，不断根据新的实践推出新的理论。在这个过程中，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界做出了重大贡献。但也必须清醒地看到，“实际上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不利境地。<sup>[1]</sup>如何解决？总书记具体提出了五个方面的要求，其中之一，就是“要加强优秀外文学术网站和学术期刊建设，扶持面向国外推介高水平研究

成果”，着重解决“说了传不开”的问题。

一般来说，我们把外文学术期刊数量、期刊被知名数据库收录、期刊被国外图书馆馆藏等作为学术期刊“走出去”的标准。据统计，目前我国外文版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主要是近十年发展起来的，基本为英文，共计60本左右，其中同时具有国内、国际刊号的约25种；国际上公认的权威数据库科学文献库（Web of science）显示，社会科学（SSCI）和艺术与人文科学（A&HCI）两个数据库2014年共收录4851本期刊，其中韩国18本，日本10本，印度10本，中国香港4本，中国大陆3本；据河南大学刘杨的统计，我国2073本社会科学学术期刊中，有1931本被国外图书馆藏，但是被200家以上馆藏的只有1本，而被30家以下馆藏的占了九成。在学术国际化日趋明显的当下，我国真正能与国际接轨的学术期刊寥寥无几的现状和“走出去”的水平，与当前的大国地位极不相称，与我国社会大变革时代的理论与实践成果极不相称。<sup>[6]</sup>新形势下，推进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走出去”，一是加快实现内容的“走出去”。就是要在坚持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挖掘新材料、运用新方法、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的基础上，积极吸收借鉴国外有益的理论观点和学术成果，在交流互鉴中，打造国际社会所能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引导国际学术界展开研究和讨论中国现象，最终推进具有中国特色、国际视野的更多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成果“走出去”。二是鼓励编辑队伍“走出去”。不仅仅是现有学术期刊编辑的“走出去”，加强国际交流，参加甚至组织学术活动，也包括一些重点期刊面向海内外聘选学术带头人进入编委、担任审稿人和兼职编辑等。三是支持语言及技术的国际化。通过与国外出版商合作等方式，加快发展以英文为主的兼顾其他语种的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鼓励改造或使用国际通行的远程采编系统，引进国内外学术不端行为检测系统等。

第四，做好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工作，必须把坚持正确学术导向作为重大标尺。总书记在座谈会讲话的最后语重心长地强调，“繁荣发展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必须解决好学风问题”。他指出“当前，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存在一些不良风气，学术浮夸、学术不端、学术腐败现象不同程度存在，有的急功近利、东拼西凑、粗制滥造，有的逃避现实、闭门造车、坐而论道，有的剽窃他人成果甚至篡改文献、捏造数据”，强调“要大力弘扬优良学风，把软约束和硬措施结合起来，推动形成崇尚精品、严谨治学、注重诚信、讲求责任的优良学风，营造风清气正、互学互鉴、积极向上的学术生态”，希望“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树立良好学术道德，自觉遵守学术规范，讲究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崇尚‘士以弘道’的价值追求，真正把做人、做事、做学问统一起来”。<sup>[1]</sup>学术期刊本来就应该发挥正确学术导向作用的一道重要“关卡”，但遗憾的是，当前我国学术期刊按版面费决定是否录用者有之，权钱交易者有之，这些不当的做法，使学术期刊走向了商品化、功利化，助长了学术腐败。

当前，发挥好学术期刊的学术导向作用，关键要做好以下几项工作：一是规范“收取版面费”行为。国外多数学术期刊对达到发表水准的自然投稿者“明码标价”收取版面费，受其影响，“版面费+拨款”，逐渐成为国内一些学术期刊维系生存的办刊模式。但我国从未在法规制度上给予版面费收取以合法地位，或规范收取行为，造成了实际上的泛滥和收取标准的极大差异，甚至将版面费作为学术论文是否录用的标准，严重损害学术公正。必须加紧出台公正、公平、公开的“版面费”制度而杜绝暗箱操作的潜在学术腐败。二是规范“学术期刊编辑”行为。明确将“三审三校”制度、学术不端行为技术检测制度、匿名同行评议制度等纳入编辑工作强制性规范制度。三是加大对学术不端行为处理的问责力度。鼓励重点期刊成立出版伦理委员会，借鉴推行事后反查、批量撤稿等处理制度，维护学术期刊的良好学风。

### 三、增强创新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评价体系的必要性和实效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评价体系不够科学”的问题亟待解决，必须“要建



立科学权威、公开透明的哲学社会科学成果评价体系，建立优秀成果推介制度，把优秀研究成果真正评出来、推广开”。<sup>[1]</sup>《中国社会科学报》的一份“学术成果问题反思”的调查显示，71%的学者认为，目前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学术成果问题非常严重，48.7%的学者认为，不合理的学术评价体系是当前学术成果问题的根源所在。<sup>[1]</sup>把“学术乱象”的根源归罪于“评价乱象”，而不是不合理的学术体制，或许有些避重就轻。但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术体系，首先必须加快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学术评价体系，则是学术界、学术期刊界的共识。“构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社会科学评价体系，已经成为中国学术走向未来、走向世界的必然要求和基本前提”，如果我们在什么是学术、什么不是学术；什么成果为优，什么成果为劣这些基本问题上，都缺乏客观、公正的评价标准，不具备必要的话语权，那就意味着我们的学术研究缺乏必要的规范和引领，形成不了自己的合力和特色。<sup>[7]</sup>目前，我国学术评价活动主要是两大类。一是学术期刊内在的评价行为。从学术期刊具体的运作程序或编辑机制来看，严肃的学术期刊是由学术共同体主办的，刊发的文章都需要经过严格的评选、编辑程序，而选择刊发、编辑文章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学术评价的过程。解决这类评价存在的问题，如前文所述，要从规范期刊编审制度入手。二是各类学术（期刊）评价机构对学术成果、学术期刊的评价行为。既包括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中心以及《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等为数不多的重要转载平台，对发表于学术期刊优秀论文成果的转载来体现对学术成果的评价；也包括更具有广泛的、导向性意义的各级各类学术期刊评价机构对学术成果进而对刊登该成果的学术期刊的评价。对这类评价活动，除强调加强这类机构的公开、透明、公正的评价机制外，最值得探讨的，则是如何创新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评价体系的问题。

2016年7月11日，汤森路透公司宣布以35.5亿美元出售旗下包括《科学引文索引》（Science Citation Index, SCI）在内的知识产权业务和科学信息业务（IP&Science）。之后，期刊及出版界联合发文呼吁期刊出版商对期刊影响因子不予重视，准备重塑期刊评价体系。在影响因子（Impact Factor, IF）退出历史舞台的呼声越来越集中的当下，反思我国的学术期刊评价一直受到来自国外评价体系的影响的学术评价之路显得十分必要。

上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运用引文数据分析和同行评议相结合的方法，综合评价期刊的学术价值，先后形成了美国科技情报研究所（Information Sciences Institute, ISI）创办于1961年的“科学引文索引”（Sciences Citation Index, SCI），以及随后创办的“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 SSCI）和“艺术与人文引文索引”（Arts&Humanities Citation Index, A&HCI）。其中重要的指标——影响因子是汤森路透公司出品的期刊引证报告中的一项指标数据，指的是该期刊在前面两年发表的源刊文在当年度的总被引用数，除以该期刊在前面两年发表的论文总数量。一般来说，一种刊物的影响因子越高，表明该期刊的影响力越大，所发表论文传播范围也更广，这就为数据库在遴选期刊时提供了具有操作性的指标。

我国早在上世纪80年代后首先在相对更适用于计量的科技期刊评价上运用影响因子指标，以此评定核心期刊。进入90年代后期，我国参照美国的评价体系，拓展至人文社会科学期刊评价，陆续出现了针对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的评价体系。目前主要是：北京大学图书馆于1992年编制的《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南京大学于1998年启动《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于1999年开始建设《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要览》、中国科学评价研究中心与武汉大学图书馆等合作开展的2009年第一次发布的《中国学术期刊评价报告》。综上，美国三大索引遴选期刊的方法，被广泛应用于我国的期刊评价活动中，采用的理论（如引文集中定律）成为期刊评价的理论基础，发明的评价指标（影响因子）成为评价期刊的主要定量指标，甚至被用作期刊评价的唯一指标。

而在学术界、期刊界，包括策源地的美国学界，都对引文集中定律理论和影响因子指标提出质疑时，我们更加有必要反思我国当前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的评价现状及其带来的负面影响。中国社会科学评价中心主任荆林波更多关注的是在实际的科研活动过程中，“这一索引工具的原始功能被逐渐异化”的问题：在研究生学位授予、科研人员职称评审、课题申报甚至研究机构评价与排名中，都把在SCI等引文数据库中所收录期刊上发表论文作为一项重要指标，由此制定了本单位的科研人员绩效考核办法，许多科研机构、高校甚至学术同行越来越依赖于以期刊影响因子来评判一篇论文甚至作者本身的科研水平。这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以刊评文”、“以刊评人”的评价怪象。<sup>[8]</sup>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评价中心在2014年创造性地提出了期刊评价新标准，提出了“AMI”评价体系（A—吸引力，M—管理力，I—影响力）。整套评价体系采取“定性定量相结合”、“客观评价与主观评价相结合、以客观评价为主”的方式。AMI指标体系为5级，共计76项子指标，指标权重全部由行业专家确定。对于难以量化的定性指标，通过将定性评价的分析结果进行定量分析。该评价体系可涵盖科研机构评价、科研工作评价、出版物评价、学科评价、个人评价等，具有较为丰富的内涵和广阔的延展性，对于有效纠正当前“重数量、轻质量”、过分推崇转载率、影响因子等倾向具有积极意义。其评价指向与当前急需提升的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的舆论引导能力以及吸引力、管理力、影响力，高度契合，为创新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评价体系做出了贡献。而从辩证、综合和动态的视角出发，促进哲学社会科学期刊评价向着更规范、更科学、更公平的方向发展，值得哲学社会科学界给予更广泛的关注和思考。

####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N]. 人民日报, 2016-5-19 (2).
- [2] 丁淦林. 中国新闻事业史 [M].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0: 13-173.
- [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八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170.
- [4] 习近平. 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 [EB/OL]. www.xinhuanet.com, 2013-08-20.
- [5] 张耀铭. 中国学术期刊的发展现状与需要解决的问题 [J]. 清华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6 (2): 28-35.
- [6] 刘杨. 中国社科学术期刊“走出去”现状研究 [J]. 出版科学, 2014 (2): 63-69.
- [7] 高翔. 构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社会科学评价体系 [N].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4-4-18 (1).
- [8] 荆林波, 逯万辉. 重构期刊评价体系 [N].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7-2-21 (1).

[责任编辑：华晓红]